

教育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幸福感影响的差异

——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

周 闯*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差异，重点关注了教育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幸福感不仅通过就业和收入具有间接效应，而且也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对于城镇职工而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比例相当；对于农民工而言，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进一步，教育影响城镇职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新生代上，而教育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都具有直接效应，并且对新生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略大于老一代。此外，稳定的就业、较高的收入、健康的身体和婚姻对于提升幸福感均具有正向作用。对于农民工来说，配偶随迁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

关键词 教育 农民工 幸福 就业稳定性 收入

一 引言

何谓幸福？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尽管对幸福的看法不同，但幸福却是每个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正因如此，幸福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普通百姓的关注，这也催生了大量关于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早期关于幸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伦理学和心理学领域。近些年，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幸福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尽管时间较短，但成果颇为丰富。在众多的成果中，收入对幸福影响的研究占据了较高的比重，主要

* 周闯，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zc020507@163.com。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4M551103）和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项目（BSH201518）的资助。

原因在于“幸福悖论”的提出 (Easterlin, 1974, 1995, 2001)。此后, 很多研究开始对“幸福悖论”进行验证, 并解释其成因。普遍接受的解释是, 与绝对收入相比, 相对收入对幸福的影响更为明显。就业对幸福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中另一个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 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失业对幸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Clark & Oswald, 1994; Winkelmann & Winkelmann, 1998; Di Tella et al., 2001)。除收入和就业外, 研究者们还从住房、预期、价值观、收入不平等、通货膨胀、失业率、财政支出等宏、微观角度对幸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幸福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经验研究中专门讨论教育对幸福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 通常是在分析其他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教育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 前者体现在能够在未来获得货币收入, 而后者除体现在能够使身心愉悦增加当前的效用水平外, 还体现在可以通过增加未来享受更多商品的能力而改变偏好。因此, 教育对幸福的影响一方面是投资品属性的间接效应, 另一面是消费品属性的直接效应 (Schultz, 1963)。在直接效应方面, 教育能够增加自我认同感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从而提升幸福感, 同时较高的教育水平又会使个体对生活产生较高的期望, 而这种期望一旦无法实现又会降低幸福感 (Easterlin, 2005; Ferrante, 2009)。因此, 理论上在考虑了就业和收入以后, 教育对幸福的影响是不明确的。经验研究中关于教育对幸福的直接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有些研究发现教育与幸福感具有正向关系 (Argyle, 1999), 但在控制了收入和就业变量后, 教育对幸福的直接效应很小 (Sandvik et al., 1993)、消失 (Argyle, 1999) 甚至是负向的 (Clark & Oswald, 1996), 这表明教育与幸福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是通过收入和就业等变量间接得以体现的。基于中国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同样得出了在控制收入和就业变量后, 教育对幸福的影响是正向 (金江、何立华, 2012)、负向 (罗楚亮, 2006; Knight & Gunatilaka, 2010) 和没有影响 (张学志、才国伟, 2011) 的不确定性结论。此外, 还有研究在分析幸福的影响因素时直接忽略教育变量, 认为教育对幸福的影响体现在其他变量中 (Appleton & Song, 2008)。教育对幸福影响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幸福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包含了不同的解释变量, 变量的不一致导致所得到的结论存在差异; 二是教育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会对幸福产生不同的影响, 现有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 数据的不一致性导致了结论的不确定性。

对已有文献加以梳理可以发现, 对中国居民幸福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多关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相对较少,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共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1.68亿人(国家统计局,2015)。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的质量。对于农民工幸福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是Knight & Gunatilaka(2010),他们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2002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幸福感低于农村居民的原因,强调预期与现实的差距是农民工幸福感较低的原因。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教育将会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因素。因此本文将焦点集中于教育,分析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并将其与城镇职工加以对比,度量教育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对象,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二 实证模型的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教育对幸福的间接效应主要是通过就业和收入加以体现,因此本文将幸福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设定为以下形式:

$$y_i^* = \alpha_0 + \alpha_1 E_i + \alpha_2 W_i + \alpha_3 S_i + \alpha_k C_i + u_i \quad (1)$$

其中, y_i^* 是个体*i*幸福感的度量指标; E_i 、 W_i 和 S_i 分别表示个体*i*的教育、收入和就业,是模型的核心变量; C_i 为其他控制变量。式(1)为幸福影响因素的完全模型,系数 α_1 度量了教育对幸福的直接效应。为了度量教育对幸福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还需要设定幸福影响因素的简约模型:

$$y_i^* = \gamma_0 + \gamma_1 E_i + \gamma_k C_i + \nu_i \quad (2)$$

如果幸福是可观测的连续变量, γ_1 即为教育对幸福的总效应,用总效应减去直接效应,即 $\gamma_1 - \alpha_1$,即可得到教育对幸福的间接效应。由于 y^* 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实际调查中通常采用有序选择变量刻画,分析中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线性概率模型和有序选择模型。Ferrer-i-Carbonell & Frijters(2004)指出,当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较大时,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和有序选择模型得到的结果非常相近,不仅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是相近的,而且变量间的关系也是相近的。然而,本文的分析不仅要关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比较完全模型和简约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来确定教育对幸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有序选择模型会产生尺度改变问题(rescaling problem)和分布改变问题(error distribution)(Karlson &

Holm, 2011), 即教育变量系数的改变混合了随机误差项变动的成分。因此本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分析。

(二)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CHIP 2007 年调查, 该调查包括城镇住户、进城务工人员 and 农村住户三个部分。数据中包括了家庭成员的基本特征、身体健康情况、教育和培训经历、就业状况、孩子的教育情况、社会关系等信息, 为就业和工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数据。本文使用城镇住户和进城务工人员两部分的调查数据, 分析中将样本限制为年龄在 16 ~ 60 岁之间, 并剔除在校学生、离退休、失去劳动能力、未就业和样本信息缺失的个体。CHIP 2007 只对在现场个体的幸福感进行了调查, 无法获得那些调查时未在现场个体关于幸福的评价信息, 因此只能将那些未在现场的样本进一步删减。最后得到城镇职工样本数为 4851 个, 农民工样本数为 5933 个。农民工的样本数多于城镇职工, 这主要是由于抽样本身的设计和样本缺失导致的。CHIP 2007 将幸福的度量分为四类, 包括“很不幸福”、“不太幸福”、“比较幸福”和“很幸福”。尽管与其他关于幸福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相比, CHIP 对幸福评价的分类要少, 然而却是唯一对农民工幸福感进行大范围调查的数据。表 1 给出了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幸福感的分布, 92.64% 的城镇职工和 89.45% 的农民工觉得生活是幸福的。将幸福感由低至高依次赋值为 1 ~ 4, 农民工幸福感的均值为 3.2181, 低于城镇职工生活幸福感的均值 3.2577。

表 1 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幸福感受分布

	城镇职工		农民工	
	样本数(个)	占比(%)	样本数(个)	占比(%)
很不幸福	37	0.76	51	0.86
不太幸福	320	6.60	575	9.69
比较幸福	2850	58.75	3336	56.23
很幸福	1644	33.89	1971	33.22
合 计	4851	100.00	5933	100.00

资料来源: 根据 CHIP 2007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变量的选取和统计描述

幸福方程中的核心变量是教育、就业和收入。经验研究中, 教育的度量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采用表示学历水平的定性变量，另一类是采用表示受教育年限的定量变量。CHIP 中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和最后学历都进行了调查。由于本文不仅要确定教育对幸福感的总效应，而且要将总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果采用学历水平这种定性变量将会使分解不易进行。因此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度量。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体现会影响个体的收入，而收入又是幸福的主要影响因素。CHIP 2007 中对个体平均每月获得的总收入进行了调查，因此采用月收入作为收入的度量。就业状况是教育对幸福产生间接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多数经验研究都得到了失业对幸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结论。在本文的分析中并没有直接引入失业变量，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就业性质的特殊性。农民工中失业个体较少，在 5933 个农民工样本中，失业个体仅为 41 人。如果农民工长期无法就业，他们会返回农村，等待城镇中新的就业机会出现，因此失业并不是衡量农民工就业状况的理想变量。CHIP 2007 对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作类型进行了调查，包括“固定工”、“长期合同工（一年及以上）”、“短期合同工”、“无合同的临时工”、“领工资的家庭帮工”、“自我经营者”、“打零工”和“其他”。从就业的稳定性来看，前两类最为稳定，而其他类型的就业稳定性较差。考虑到个体能否稳定就业，教育水平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采用就业稳定性作为就业类型的度量，将就业类型为“合同工”和“长期合同工（一年及以上）”定义为稳定就业。其他影响幸福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健康、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居住在省会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方程中还引入了表示配偶是否跟随迁移的变量。表 2 给出了各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

表 2 变量的定义和统计描述

变 量	变量定义	城镇职工		农民工	
		均 值	标准差	均 值	标准差
教 育	受教育年限	12. 9594	3. 1103	8. 9656	2. 6866
年 龄	年龄	39. 8786	9. 5481	31. 3667	10. 1396
女 性	虚拟变量,女性 = 1	0. 4387	0. 4963	0. 3916	0. 4881
健康状况					
好	虚拟变量,非常好或好 = 1	0. 7501	0. 4330	0. 8449	0. 3620
一 般	虚拟变量,一般 = 1	0. 2309	0. 4214	0. 1401	0. 3472
差	虚拟变量,不好或非常不好 = 1	0. 0190	0. 1364	0. 0150	0. 1214
婚姻状况					
初 婚	虚拟变量,初婚 = 1	0. 8271	0. 3782	0. 6124	0. 4873
再 婚	虚拟变量,再婚 = 1	0. 0184	0. 1343	0. 0082	0. 0899

续表

变 量	变量定义	城镇职工		农民工	
		均 值	标准差	均 值	标准差
同 居	虚拟变量,同居 = 1	0.0014	0.0380	0.0038	0.0613
离 异	虚拟变量,离异 = 1	0.0205	0.1419	0.0104	0.1016
丧 偶	虚拟变量,丧偶 = 1	0.0058	0.0759	0.0045	0.0672
未 婚	虚拟变量,未婚 = 1	0.1263	0.3322	0.3603	0.4801
月收入	月收入除以 1000	2.3494	2.3668	1.6728	1.2465
稳定就业	虚拟变量,稳定就业 = 1	0.7468	0.4349	0.3969	0.4893
配偶随迁	虚拟变量,配偶随迁 = 1	—	—	0.4727	0.4993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2007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表 3 给出了幸福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在不引入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变量的情况下,教育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是教育对幸福感的总效应。教育年限增加 1 年会使城镇职工的幸福感增加 0.0131,使农民工的幸福感增加 0.0195。从控制变量来看,健康、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得出的趋势基本一致。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镇职工,健康对幸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幸福的影响呈正 U 型关系,拐点大约出现在 40 岁左右。与单身个体相比,初婚个体的幸福感更高一些,但离异或丧偶个体的幸福感更低。是否居住在省会城市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尽管省会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的幸福,但较高的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却降低了居民的幸福。对于农民工来说,配偶随迁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夫妻共同迁移能够增加农民工的幸福感。

表 3 幸福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 量	线性概率模型				有序选择模型			
	城镇职工		农民工		城镇职工		农民工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教育年限	0.0131 ***	0.0069 **	0.0195 ***	0.0179 ***	0.0260 *** [0.0091]	0.0138 ** [0.0048]	0.0346 *** [0.0123]	0.0318 *** [0.0113]
稳定就业		0.0474 **		0.0310 *		0.0930 ** [0.0325]		0.0533 * [0.0189]

续表

变 量	线性概率模型				有序选择模型			
	城镇职工		农民工		城镇职工		农民工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收 入		0.0230 ***		0.0197 *		0.0471 *** [0.0164]		0.0341 * [0.0121]
收入平方		-0.0005 ***		-0.0002		-0.0010 *** [-0.0003]		-0.0001 [0.0000]
身体好	0.5496 ***	0.5364 ***	0.4510 ***	0.4418 ***	1.0075 *** [0.3529]	0.9850 *** [0.3437]	0.7376 *** [0.2615]	0.7225 *** [0.2559]
身体一般	0.3023 ***	0.2909 ***	0.2364 ***	0.2299 ***	0.5181 *** [0.1815]	0.4978 *** [0.1737]	0.3583 *** [0.1270]	0.3474 *** [0.1230]
年 龄	-0.0262 ***	-0.0290 ***	-0.0189 ***	-0.0206 ***	-0.0521 *** [-0.0183]	-0.0578 *** [-0.0202]	-0.0335 *** [-0.0119]	-0.0366 *** [-0.0130]
年龄平方	0.0003 ***	0.0003 ***	0.0002 ***	0.0003 ***	0.0006 *** [0.0002]	0.0007 *** [0.0002]	0.0004 *** [0.0001]	0.0005 *** [0.0002]
性 别	0.0188	0.0413 **	0.0153	0.0238	0.0343 [0.0120]	0.0798 ** [0.0279]	0.0251 [0.0089]	0.0399 [0.0141]
初 婚	0.1007 **	0.0903 **	0.1193 ***	0.1188 ***	0.1985 ** [0.0695]	0.1779 ** [0.0621]	0.2072 *** [0.0735]	0.2066 *** [0.0732]
再 婚	0.1149	0.1137	-0.0195	-0.0219	0.2267 [0.0794]	0.2242 [0.0782]	-0.0204 [-0.0072]	-0.0239 [-0.0085]
同 居	-0.1977	-0.2018	-0.0744	-0.0748	-0.3892 [-0.1363]	-0.4033 [-0.1407]	-0.1452 [-0.0515]	-0.1469 [-0.0520]
离 异	-0.1997 ***	-0.2017 ***	-0.3001 ***	-0.3026 ***	-0.3623 *** [-0.1269]	-0.3695 *** [-0.1289]	-0.4871 *** [-0.1727]	-0.4916 *** [-0.1741]
丧 偶	-0.4957	-0.5005 ***	-0.1794	-0.1803	-0.8585 *** [-0.3007]	-0.8725 *** [-0.3045]	-0.2799 [-0.0992]	-0.2809 [-0.0995]
省会城市	0.0145	0.0102	0.0195	0.0217	0.0266 [0.0093]	0.0181 [0.0063]	0.0377 [0.0134]	0.0415 [0.0147]
配偶随迁			0.0870 ***	0.0880 ***			0.1582 *** [0.0561]	0.1598 *** [0.0566]
常数项	3.0741 ***	3.1445 ***	2.8445 ***	2.8451 ***				

注：[] 内为边际效应，*、** 和***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2007 数据计算得到。

当在幸福方程中引入收入和就业稳定性变量后，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教育的系数变小了，这说明教育对幸福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间接体现在了就业和收入对幸福的影

响中。从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尽管教育的系数变小了，却仍然是显著的，说明教育对幸福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本文的分析结果与已有的一些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教育不仅对幸福具有间接效应，而且具有直接效应，说明教育不仅仅是通过为个体带来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就业提升幸福感，同时还能够直接带来幸福感的提升，比如教育能够增加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和优越感、教育能够增加个体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这些都会增加幸福感。

对比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幸福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引入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变量前后，教育对城镇职工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由 0.0131 下降至 0.0069，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由 0.0195 下降至 0.0179，教育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幸福影响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52.67% 和 91.79%。教育对城镇职工幸福感的影响有较大部分是通过就业和收入发挥间接作用，但对于农民工来说这部分间接作用则很小，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职工（李培林、田丰，2010）。此外，农民工在城镇主要从事需要体力和一定职业专项技能的工作，农民工能否稳定就业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职业技能。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对幸福的间接影响就较小。然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却能够使农民工较快地适应城镇的生活节奏，因此就更多地体现在了对幸福的直接影响上。

为进一步对结果加以验证，本文还给出了有序选择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教育对城镇职工非常幸福概率的边际效应由简约模型中的 0.0091 下降至完全模型中的 0.0048，后者占前者的 52.75%；教育对农民工非常幸福概率的边际效应由简约模型中的 0.0123 下降至完全模型中的 0.0113，后者占前者的 91.87%。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与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都较为相近，尽管这一比例混合了随机误差项变动的影响。

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幸福方程中就业稳定性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并且就业稳定性在提升城镇职工幸福感中的作用要大于农民工。因此增强就业稳定性，降低失业的风险，能够提升幸福感。收入对城镇职工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二次效应，拐点大约为月收入 23000 元，考虑到这是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因此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仍然会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收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二次效应，通过各项收入保障制度增加农民工收入并保证收入权益的顺利实现，能够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在引入收入和就业稳定变量前后差别并不明显。唯一例外的是，城镇职工幸福方程中性别变量的系数变得显著了。在考虑收入和就业状况后，女性的幸福感更高，说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这种责任所产生的压力降低了男性的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①。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在就业的选择还是在城镇的生活习惯上都与老一代农具有明显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将会是城镇融合的主要群体,他们在城镇生活得是否幸福是城镇化质量的一个重要反映。为考察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并将其与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城镇职工加以比较,本文在农民工幸福感方程中引入标识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虚拟变量,并引入新生代农民工虚拟变量与教育水平的交叉项,城镇职工幸福感方程中采用与农民工幸福感方程同样的处理方式。

表 4 教育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幸福感影响的差异

变 量	城镇职工		农民工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简约模型	完全模型
新生代	-0.3384 **	-0.3512 ***	-0.1457 **	-0.1446 **
教育年限	0.0107 ***	0.0044	0.0142 ***	0.0128 ***
新生代 * 教育年限	0.0221 **	0.0227 **	0.0134 **	0.0130 *
稳定就业		0.0473 **		0.0298 *
收 入		0.0234 ***		0.0203 *
收入平方		-0.0005 ***		-0.0002
身体好	0.5516 ***	0.5383 ***	0.4501 ***	0.4410 ***
身体一般	0.3036 ***	0.2921 ***	0.2342 ***	0.2277 ***
年 龄	-0.0328 ***	-0.0367 ***	-0.0217 ***	-0.0238 ***
年龄平方	0.0004 ***	0.0004 ***	0.0003 ***	0.0003 ***
性 别	0.0170	0.0397 **	0.0119	0.0206
初 婚	0.1120 ***	0.1014 **	0.1272 ***	0.1265 ***
再 婚	0.1256 *	0.1244 *	-0.0125	-0.0152
同 居	-0.1834	-0.1872	-0.0726	-0.0729
离 异	-0.1871 ***	-0.1891 ***	-0.2933 ***	-0.2961 ***
丧 偶	-0.4856 ***	-0.4906 ***	-0.1693	-0.1705
省会城市	0.0144	0.0100	0.0186	0.0207
配偶随迁			0.0868 ***	0.0877 ***
常数项	3.2465 ***	3.3418 ***	2.9613 ***	2.9693 ***

注: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资料来源:根据CHIP 2007数据计算得到。

①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并未公布新生代农民工的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2015),但《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国家统计局,2014)。

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要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收入以及其他生活方面的预期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较高的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新生代城镇职工的幸福感也低于老一代城镇职工,并且这种差距要大于新老农民工幸福感的差距。与老一代城镇职工相比,新生代城镇职工在工作、生活等方面所面对的竞争更为激烈,这种竞争的压力使新生代城镇职工的幸福感显著下降。从教育和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在不引入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变量以前,教育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新生代的影响要大于对老一代的影响,其中教育对老一代城镇职工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0.0107,对新生代城镇职工的影响则为0.0328,比老一代城镇职工高0.0221。教育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为0.0142,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总效应则为0.0276,比老一代高0.0134。在引入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变量后,教育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表现出了不同的趋势。在城镇职工中,教育对老一代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但对新生代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仍然是显著的,并且这种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9.21%。因此,教育对老一代城镇职工来说主要体现为获得更高收入和更理想就业的投资价值,而对新生代城镇职工则不仅体现为投资价值而且更多地体现在直接价值上。与城镇职工不同的是,在农民工的幸福方程中引入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变量后,教育和交叉项的系数略有下降。因此,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效应。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90.14%,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一比例更高,为93.48%,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仍然较小。就业稳定性、收入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与表3的结果基本相同。

五 结论与建议

幸福的影响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并重点分析了教育对幸福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得到了如下结论:

(一)收入对城镇职工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拐点大约出现在月收入23000元左右;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但不具有二次效应。考虑到月收入23000元是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继续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将能够提升城镇居民整体的幸福感。对于农民工来说,继续通过各项收入保障制度增加农民工收入并保证收入权益的顺利实现,仍然是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途径。

(二) 获得中长期劳动合同进而强化就业的稳定性,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幸福感均具有正向影响。城镇职工获得一年期及以上劳动合同的比例在70%以上,较好的就业稳定性是城镇职工较高幸福感的保证,然而农民工获得一年期以上劳动合同的比例却不到40%,就业稳定性要远低于城镇职工,这阻碍了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应采取劳动保护措施增加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比如扩大就业服务机构对农民工的覆盖率,降低用工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等,使用工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通过稳定的就业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

(三) 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总效应要大于城镇职工,但教育影响城镇职工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大体相当,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教育对城镇职工来说兼具投资价值和消费价值,但对农民工来说投资价值却较小,农民工在迁移前所受到的教育更多地在于帮助农民工了解城镇生活,较早地适应城镇生活的节奏,而在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和理想就业的获得上发挥的作用较小。因此,应着力增强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比如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使城镇的教育资源向农民工开放,通过再教育增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使教育的投资价值得到更多的体现。

(四) 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新生代的幸福感都要低于老一代,但教育对新生代幸福影响的总效应要大于老一代。新生代与老一代相比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更高的期望,与此同时,他们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却更为激烈,期望与现实的差距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但较好的教育却能够使他们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拉近了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幸福感的提升。此外,教育对城镇职工的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新生代上,对老一代城镇职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还要略高于老一代。因此,对于新生代城镇职工,需要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教育的消费价值上,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的焦点还应该是教育的投资价值。

参考文献:

- 金江、何立华(2012),《教育使人幸福吗?——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第6期,第36-43页。
- 李培林、田丰(2010),《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第1期,第69-87页。
- 罗楚亮(2006),《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经济学(季刊)》第2

- 期, 第 817 - 840 页。
- 张学志、才国伟 (2011), 《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第 9 期, 第 63 - 73 页。
- 国家统计局 (2014), 《2013 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 国家统计局 (2015), 《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 Appleton, Simon & Lina Song (2008).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 *World Development*, 36(11), 2325 - 2340.
- Argyle, Michael (1999). Causes and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In Daniel Kahneman, Ed Diener & Norbert Schwarz (ed.),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353 - 373.
- Clark, Andrew & Andrew Oswald (1994). Unhappiness and Unemploy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104(424), 648 - 659.
- Clark, Andrew & Andrew Oswald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3), 359 - 381.
- Di Tella, Rafael, Robert MacCulloch & Andrew Oswald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 335 - 341.
- Easterlin, Richard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David & Melvin Warren Reder (ed.),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89 - 125.
- Easterlin, Richard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7(1), 35 - 47.
- Easterlin, Richard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3), 465 - 484.
- Easterlin, Richard (2005). A Puzzle for Adaptive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6(4), 513 - 521.
- Ferrante, Francesco (2009). Education, Aspira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Kyklos*, 62(4), 542 - 562.
- Ferrer-i-Carbonell, Ada & Paul Frijters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4(497), 641 – 659.
- Karlsou, Kristian Bernt & Anders Holm (2011). Decompos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Effects: A New Decomposition Method.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9(2), 221 – 237.
- Knight, John & Ramani Gunatilaka (2010).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8(1), 113 – 124.
- Sandvik, Ed, Ed Diener & Larry Seidlitz (1993).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Convergence and Stability of Self-Report and Non-Self-Report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1(3), 317 – 342.
- Schultz, Theodore (1963).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nkelmann, Liliana & Rainer Winkelmann (1998). Why Are the Unemployed So Unhappy?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Economica*, 65(257), 1 – 15.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the Well-Being between Migrants and Urban Workers

Zhou Ch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workers. We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duc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We find that both the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employment and income) and the direct effect exist. These two effects are almost equal for urban workers, but the direct effect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indirect effect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We further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and the old generation of workers, and find that the direct effect exists in the new generation rather than in the old generation for urban workers. However, the direct effect exists in both new and old generations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ratio of direct effect to total effect in the new gener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ld generation. In addition, stable employment, higher income, healthy body and marriage can also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and spouse migration can also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educ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stable employment, income

JEL Classification: I25, I31, J61

(责任编辑: 西 贝)